

试论日本小说与日本 文化的个性化

东北师范大学外文系 徐 冰

小说,作为一个文类(geme)概念,进入近代在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被认同了,但是,生长于不同文学风土上的小说,其面貌却是颇有区别的。如果把孕育发展在东方岛国的日本小说与以广袤的大陆为依托的欧美小说,中国小说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对人生观照的深刻性、丰富性,还是情感强度、审美取向都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小说所体现出的差异,当然有诸多原因,而其中重要的原因,即是各民族文化差异的作用。日本小说在日本人读者群中很受欢迎,在非日本人读者中却知音寥寥。有学者认为这反映了日本小说的深不可测,是一个外人不能进入的独特世界。其实这可能是一种错觉。造成小说读者接受差异的根本原因,我以为在于文化。作为非日本人读者,要进入日本小说的世界,首先需要逾越的是文化障碍。了解日本文化特性,是理解日本小说特性的必要前提;而理解了日本小说特性,则可更深入地理解日本小说。

—

一般认为,日本文化最为显著的特征,在于它的群体文化的社会结构和心理模式。日本学者石田英一郎在《日本文化论》

里,从日本文化历史形成的角度,分析日本文化的特有本质。他的思考循着两条线索展开。第一条,是分析属于水稻栽培文化圈的日本文化的典型特征。另一条,则考察了作为单一民族的日本千百年来在岛国上形成的同质的文化。

种植水稻,这是进入现代工业化以前的日本人主要的生产方式,这一方式决定了日本人的人际关系的基本方式。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诸如建造水坝、引水系统等艰巨工程,仅凭个人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必须以村落为单位,结成一个齐心协力的共同体,才有可能完成整个生产过程。共同生产与共同生存,是这样的共同体中的基本原则。在成员个人与集团之间,个人必须服从集团的利益和意志,不能随意而为;在成员与成员之间,则构成相互依赖、共损共荣关系,认同一种道德观念,法律规定,审美观念和风俗习惯,形成牢不可破的群体结构。日本社会,则建基于这样的共同体之上,是这样的共同体的大的集合。日本社会的群体结构,产生了群体性文化。日本的群体结构,远比以游牧文化为基础在古代欧洲人的社会群体牢固,也强于中国大陆。中国大陆虽然与日本一样,都以农耕文化为基础,但由于地域、气象条件不同,中国大陆既有水田又有旱田,农业呈多元化形态。在中国历史上,疏导河流,开凿运河等大型水利工程,对中华民族的融合、凝聚,对中华文化的形成,也曾起过重要作用,但对中华文化形态的形成起到重大作用的主要是中原文化。中原属旱田区域,与需要集体力量完成的水田耕作相比,旱田耕作的单位都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此外,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战乱不断,分分合合。而在航海技术落后的古代,大海将日本与亚洲大陆隔开,日本民族偏居一岛,地理与心理双重封闭,极少与外民族交流沟通,这也自然强化了本民族成员之间的连带关系。

荒木博之在《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中,把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进行比较,提出了“游牧文化具有自律的性格,农耕文化具有他律的性格”的命题。^①如前所述,同在农耕文化圈中,日本文化所表现的他律性又是最强的。置身于日本民族内的个体,代代传承,形成了与群体文化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行为方面,个人的利益服从自己所属的集团利益;在思维方面,个人意志服从集团的意志,很难体现出鲜明的个性。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日本人、日本文化的性格是非个性化的。当然,这需要做些说明:非个性不等于无个性。非个性,是尽量压抑、深藏自我的个性,是一种有意识地消匿自我个性的行为。而这,恰恰正是日本人、日本文化的最显著的个性特征。

二

日本的群体文化的土壤孕育、滋养了日本的小说,使它显现出与其他国度的小说作品迥然不同的样态。

作为叙事文学的重要样式,小说的基本任务是塑造人物形象。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涌起之前,无论中国还是欧洲的小说,都强调写出人物形象的典型性格。罗丹认为:“有性格的作品,才是美的。”他说的是艺术作品,也适用于小说。卢卡奇说:“现实主义主要的美学问题就是充分表现人的完整个性。”^②在讨论非现实主义作品时,人物性格的典型化程度如何,也是卢卡奇注目的重点。他甚至认为,柏拉图的《会饮篇》之所以千百年来不失其感染力,其主要原因,不仅在柏拉图的对话给予了人们一些观念,而在于给予了人们有“感情的活的人物”,“这些活的人物……以他们的人的个性使人注目和不能忘记——而且所有这些人都都是性格化的”。^③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中,也不乏相近的观点。脂砚斋评价《红楼梦》的人物,对其“移之第二人万不可”

的性格大为赞赏,表明了其对人物性格化的重视程度。

证之以欧洲与中国的小说作品,其例子更是不胜枚举。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都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舞台上,在丰富曲折的情节和真实的生活情境中,塑造出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通过封建贵族家庭的由盛而衰过程的描写,全面地展现封建社会政治、经济、风俗、人情的方方面面,塑造了贾宝玉等众多人物形象,尤其是贵族家庭里的各类女性形象。《红楼梦》明显继承了中国小说审美论中重视人物个性塑造的优秀传统,从语言到动作,从外貌到内心,立体多维地展示人物性格的多种侧面。同为贵族小姐,探春果断厉害,惜春胆小谦恭;同是丫环,袭人温厚老成,晴雯爽快泼辣。她们个性迥异,各领风骚。其中,贵族少妇王熙凤的性格最具特征。她狡诈机智,思维敏捷,“明是一把火,暗里一把刀”,既清醒又糊涂,既刚强又脆弱;她机关算尽,掌握了贾府运营大权,但最终反被自己聪明所误,死于凄凉。《红楼梦》在动态中多层次塑造出的这个“凤辣子”形象,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日本的《源氏物语》被认为是与《红楼梦》的题材,主题都相当类似的作品。紫式部在这部小说里也塑造了一大批宫廷贵族女性:皇后、妃子、女官、侍女等。但由于作者不是采用典型化,而是采用类型化的手法描写人物,因此未能塑造出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如果把《源氏物语》中的主要人物光源氏与《红楼梦》的贾宝玉加以比较,可能会看得更为明显。光源氏和贾宝玉,都是混迹于钗裙粉黛中的花花公子,但《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通过对人物的审美观察,提炼出高度典型化和富有表现力的动作,使贾宝玉的动作具有清晰的动感和具象性,又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多维展示,塑造出了极具个性特色的形象。相比之下,光

源氏便显得呆板单调,缺少生气。总括而观,比起性格刻画,《源氏物语》更重视描写环境,展现细节,渲染气氛,这增强了作品的抒情品格,却削弱了人物形象的个性深度,这不能不说是日本叙事文学的一大缺憾。

到了近代,由于欧风美雨的冲击、影响,日本迅速实现了现代工业化,日本文化的结构和形态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明治维新初期,应和着西方人文主义启蒙思潮,在日本,提倡自由、平等、民权的呼声也颇为高涨,至1877年(明治10年)前后,甚至发展成为群众性的自由民权运动。但是,从本质上说,日本传统文化结构并未在近代化过程中改变。由于日本近代社会变革采取的自上而下的方式,是以国家力量推行的维新,因此,作为个体的日本人,并未能在维新变革和近代化过程中养育出强烈的个性意识,未能获得个性自由发展的空间,国家的权威,作为一种绝对的力量,制约着每一个个体的人。自由民权运动很快即告失败,绝对主义思想与国家权力结合,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日本近代文学的先驱作家二叶亭四迷的代表作《浮云》,即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状况。《浮云》的主人公内海文三是具有典型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特征的艺术形象。他置身于由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的变革时期,企图以新的人生价值观念为行为准则;他正直善良,坚守个人的尊严,不肯逢迎上司,不肯与世俗同流,终于为社会所不容。如果说内海文三的行为,表现了近代知识分子对个性解放、个性自由的向往与追求,那么,可以说这追求的力量是相当微弱的;如果说内海文三是一个具有典型个性的形象,那么,这一形象的塑造方法,也与其在小说中的结局一样,没有广阔的前景。日本近代小说,除《浮云》等少数作品外,极少出现有血有肉,独具个性的艺术形象。即使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川端康成,他的《雪国》、《古都》、《睡美人》等代表性作品,也

很少有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的作品里最令人记忆难忘的,是风俗、氛围、纤细的感觉和朦胧的境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在废墟上很快复苏,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关于日本奇迹出现的原因,已有众多学者做出各种解释,其中最具影响的观点认为,日本传统文化——群体文化结构,与现代化的工业生产方式对接融洽。现代化工业把人组合在生产过程的一个个环节之中,按照规定好的程序运作,不允许个性发挥,不允许个体独出心裁的创造。这与日本传统的“稻作”生产方式极其相近,因此,日本传统的群体文化意识便在现代工业组织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现代的日本人一旦步入社会,在企业就职,便终身归属于自己的集团,思想、行为便与自己集团的其他成员一样整齐划一,公司成了自己的依托,而“家”的意义则成了仅供睡几个小时觉的一块“榻榻米”。

毫无疑问,日本的群体文化意识在将个体力量凝聚起来,促进民族兴盛,经济繁荣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同时也带来了负面效应,它使日本人放弃个性化的思维方式,严重地压抑了人的个性自由发展。人失去了个体的特征和面貌,在现代,则异化成现代工业庞大机器的一部分。这一文化背景,决定了战后日本小说的基本面貌。从文学思潮上看,战后现代主义文学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反对现实主义的创造方法,反对塑造典型的性格;从社会文化背景看,则因为人的个性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空前泯灭,体现在小说里,则失去了以往的特征,都成了眉目不清的符号。如安部公房的《墙壁》中的主人公,一觉醒来竟忘记了自己的名字;大江健三郎的《奇妙的工作》里的工作者,竟在工作中觉得自己与工作对象——被屠宰的狗没有什么不同。不必说日本的现代派小说是受了欧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后发展起来的,但其成为战后日本小说的主流,却主要是日本现代社会文化背

景决定的。

三

近代以来,亚洲各国普遍面对着西方文化的强烈挑战,各自做出不同的“反应”。考察中日两国文学“挑战——反应”的过程,可以窥知各自文化结构类型的区别。

几乎所有的西方近代文艺思潮、流派,都曾在日本和中国演进过一遍。中国近现代文学,最终选择了现实主义做为自己的基本道路。现实主义文学,始终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的主潮。

那么,日本近代文学的情形怎样呢?早在明治年间,现实主义就由二叶亭四迷介绍到了日本。然而它在那里的处境却是举步维艰、坎坷曲折。日本的作家们对于个性化的理论,肯定绝非一窍不通,但在创作实践上,则很难突破传统的束缚,刻画出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如果从审美主体、审美对象、作品、接受作品的读者群这几个层面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其症结在于日本社会的现实,在于作家自身的审美取向,在于日本读者的特定文化心理结构。朱光潜说:“总的来说,18世纪以前的西方学者都把典型的重点摆在普遍性上面,18世纪以后则典型的重点逐渐移到个性特征上面,所以18世纪以前,‘典型’几乎与‘特征’成为同一词。这个转变主要由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发展。”^④在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的诞生,宣告了中世纪漫长而又黑暗的宗教统治的结束。以全新的姿态登上人类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用人性反对神性,向旧世界的传统观念发出挑战,莎士比亚借哈姆莱特之口,发表了庄严的人的宣言。文艺复兴充分显示了人对自由本质的觉醒。而在日本,尽管19世纪下半叶发生了明治维新,其后又出现了自由民权运动,二次大战结束后又在美军的占领下实行了民主化,但这些努力都没有撼动日本文化中最本

质的东西。群体文化的重压使日本人习惯将自己的个性掩藏起来,但作为集团中的一员,既然为这个群体承担了义务,也就有资格提出自己的要求和主张,然而这种要求是以不伤害整体的统一性为限度的,日本文化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其社会成员的个性自由提供了一个允许活动的空间范围,日本人的个性在这群体与个体的夹缝中得以生存,人的行为在这块狭小的天地里显示出个性化的特征。现实主义在日本匆匆即逝,而记述个人琐事的“私小说”却常盛不衰,其深层的文化原因,或许就在于此。

作家是人类中最具独立人格的一群,他们对自由的追求、对个性解放的渴望最为强烈,但面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无法改变的社会现实,日本的作家们进退维谷,于是,一部分人走向自然主义;另一部分走上了现代派小说家之路;还有一部分对现实的追求、对艺术的追求完全绝望,便勇敢地拥抱死神。而高擎现实主义大旗,敢于向传统的文化观念发起冲击并获成功的,实在为数不多。如果说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和再现的话,那么日本的文学作品、日本的小说便反映了群体文化、群体意识对个性的压抑这一严酷的现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男人们被强征入伍。虽然他们有妻子儿女,仍然不得不走向死亡阴影笼罩的战场。那么,当一个人脱离了国家体制、群体文化的羁绊,孤身独处密林时,他还会杀人吗?单独的个人不会杀人,将这种想法表现出来,成为日本战后派作家大冈升平创作《俘虏记》的直接动机,在此,这位正直的作家对日本的群体文化的本质和作用进行了痛切的反思。

通常,作为审美主体的作家不愿触及日本社会的现实、深入挖掘人性;既是审美对象也是作品的接受者的日本国民又很少表现自己的个性、展示个性美;日本社会现实没能给作家提供具有鲜明性格特征的可以尽情表现的素材,这就制约了擅长用典

型化的手段去塑造人物的现实主义文学在日本的发展,导致了最适合日本文化土壤和日本人审美习惯,长于表现人物内心苦闷的私小说的产生和昌盛。

抛开各民族之间存在鉴赏心理、审美习惯的差异等因素不谈,未能成功地塑造出众多活生生的、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因而引起读者的强烈的共鸣、为其提供商品味的艺术享受,这或许是日本小说难以走入世界文学殿堂、获得普遍青睐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

日本的群体文化和自然环境,在日本人心中营造起一道牢固的精神壁垒,使他们沉湎于“日本特殊论”中。而这种“日本特殊论”在日本人的潜意识里是与“日本优秀论”、“日本第一论”等同的。日本人习惯地认为日本的一切都是优秀的,对本国的文化充满自豪感,并由此产生了排斥、轻视外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由群体文化派生出来的民族主义,使日本在经济上获得了成功,也曾把日本和世界特别是亚洲国家拖向灾难的深渊。即便在今天,亦不乏其例。日本一家百货公司的职员为了推销巧克力,竟然解够通过强大的商业宣传,编造了一个现代神话,使许多日本姑娘在情人节这天向自己熟悉的男士赠送巧克力。历史和现实的一个个例证,都在说明日本人的群体意识、群体文化,一旦被引导,便会产生不可遏止的力量。

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相互沟通和理解。而由于日本人的独特性意识过于强烈,就使得他们习惯地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衡量外部世界。同样,外国人对日本的事物和日本人也常常难以理解。这就妨碍了日本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流,使日本文化难以与整个人类文化

接轨,因此,日本人被称为“国际孤儿”。

日本小说也是这样,由于它一味描写日本人独特的审美情绪,诉说其内心世界的自白和岛国生活的精神体验,因而难以唤起非日本人读者的共鸣,难以与世界文学的大潮汇流。

战后,日本人抓住历史给予的一个个机会,埋头苦干,使经济获得了迅速腾飞,国际贸易成了日本人赖以发展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西方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潮水般涌入日本,美国人成为日本人羡慕、模仿的对象,在纽约或巴黎流行的服饰,一夜之间,就可能套在东京或大阪的姑娘、小伙子身上,西方现代音乐也在日本赢得了无数知音。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先导,日本人开始了张扬个性,呼唤人性的解放,向旧有的价值体系发出了勇敢的挑战。然而,传统的力量仍然十分强大,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化模式和民族精神很难靠一两代人的努力来彻底改变,在一些西方人眼里,“虽然今天日本在表面上似乎比日益没落的英国更先进、更现代化,实质上她在许多方面更接近基督教尚未彻底清除异教残余的中世纪欧洲”。^⑤

人们期待着聪明、勤奋的日本民族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把群体、个体的位置调整到一个最佳距离和角度,获得精神上的彻底解放,同时也盼望日本小说的艺苑绽出鲜艳、瑰丽的奇葩。

(责任编辑:林 昶)

①〔日〕荒木博之:《日本人的行为方式》,日本讲谈社,现代新书。

②③《卢卡奇文学论文集》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9页。

④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

⑤〔荷〕伊恩·布鲁玛:《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光明日报出版社。